

# 量词和量词结构再分析

杨永忠

(云南财经大学 国际语言文化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1)

**摘要:**本文首先提出量词和量词结构分析上的一些问题。量词并非核心词,而仅仅是附加于中心语的附缀,其本身并非其所在结构的中心语,因而无法形成最大投射 CIP 或 nP。在这一框架下,对 DP 分析和量词结构理论做了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讨论了量词前后成分之间的句法-语义关系、线性特征、语义角色、特征赋值、句法表现形式等问题,旨在运用形式句法学的短语结构理论来准确地表示量词结构内部的句法-语义关系,为不同语言的量词结构提供统一的解释。

**关键词:**量词;量词结构;中心语;短语结构;功能语类

## Revisiting Classifiers and Classifier Constructions

YANG Yongzh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anguages and Cultures,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Kunming 650221, China)

**Abstract:** Some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analysis of classifiers and classifier constructions are raised in this paper. The classifier, as a mere adjunct adjoining to the head, cannot serve as the head of the noun phrase containing it, and as a result it cannot project as CIP or nP. Under this approach, the DP analysis and classifier construction theory are further refined. The constituents which precede and follow the classifier are analyzed in terms of their syntactic function, semantic relation, linear features, thematic roles, feature assignment and syntactic representations in order to represent the classifier construction with the X-bar phrase structure theory appropriately and present a universal approach to classifier constructions in various languages.

**Key words:** classifier; classifier construction; head; phrase structure; functional category

### 1. 引言

作为汉语名词短语研究的一部分,量词和量词结构一直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国内汉语言学界针对量词的属性及功能、量词与名词的搭配规律、量词的语法化、数量结构的变化以及历史文献中的量词使用情况等问题展开了大量的探讨(吕叔湘 1981;王力 1980;高名凯 1996;朱德熙 1983;黄伯荣、廖序东 2002;马庆株 1998;贝罗贝 2000;李若晖 2000;张谊生 2003;蒋颖 2005;陈练军 2005;安丰存、程工 2015)。与之不同的是,国外语言学者则往往采用生成语法理论框架,着重研究量词的句法地位和量词结构的句法分析问题。从现有研究来看,在量词结构分析问题上,如果不考虑个体彼此间的具体差异,那么,生成语法学界量词研究可以抽象出这样一种观点:量词是数量名短语的中心语,整个数量名短语都是以其为中心的投射,即 CIP(Classifier Projection)(Tang 1990; Gao 1993;Xue & McFetridge 1995;Au Yeung 1997,2005;Cheng & Sybesma 1999;Li 1998,1999;Hu &

Pan 2000; Tsai 2003; Jiang 2012)。这样的观点将量词分析为功能词,这就与将量词视为实词或体词的国内权威汉语语法著作的观点相左。由此,量词在语法体系中担任什么角色以及量词结构如何分析等问题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吴义诚 2014;安丰存、程工 2014;程工等 2015;何晓炜、蔡激浪 2015)。

本文拟对生成语法关于量词的核心地位说加以讨论,分析其理论缺陷,然后在生成语法框架内提出我们对量词和量词结构的重新认识,并借以补充和完善 DP 分析和量词结构理论。

## 2. 量词的核心地位说及其理论缺陷

生成语法学界普遍认为,量词是功能语类,可以有自己的投射,因而将量词分析为量词结构的中心语,如(1)所示。差异仅仅在于:有的将数词和量词作为一个句法体处理,二者基础生成于同一个节点之下,即中心语位置(Tang 1990:348;Xue & McFetridge 1995:8),如(1a)所示;有的则将数词和量词分开处理,数词充当 CIP(量词投射)的标志语(Au Yeung 1997,2005; Cheng & Sybesma 1999; Hu & Pan 2000; Tsai 2003),如(1b)所示。

- (1) a. [ <sub>CIP</sub> Spec [ <sub>CI'</sub> Num Cl [ <sub>NP</sub> N ] ] ]  
 b. [ <sub>CIP</sub> Num [ <sub>CI'</sub> Cl [ <sub>NP</sub> N ] ] ]

这两种分析模式都赋予量词以相同的句法地位,即中心语地位。它们均放弃了量词前成分与量词后成分同属一个子句的假设,同时也不承认量词结构内部的修饰关系。

诚然,对量词结构做如此分析,有很大好处,可以为各种量词结构提供一个相同的底层结构,因而能够解释更多的语言现象。然而,此类分析的问题在于没有解释为什么要将数词和量词当作一个整体置于同一个节点之下,且忽略了量词短语内部的成分具有何种性质,其相互关系为何等问题。由于数词是实词,将其作为中心词并使其投射位于功能语类量词投射的上层,就会与语段推导理论的基本思想相悖。而且,实词投射与功能投射相互交叉,会导致语段无法构筑,进而导致语段循环推导失败(程工等 2015)。最为关键的是,这两种分析模式都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即它们都必须证明这种结构形式存在的合理性,它们都必须能解释量词结构所代表的句法关系和语义内涵。如果承认量词为中心语,那么,“那三本书”中的“本”与“书”应当形成一个句法单位,可以在句子中单独起作用,相反,“那三”与“本”不构成一个句法单位,也不单独发挥作用。然而,语言事实却并不支持这一分析,而且,这样的分析不符合汉语语法的构造原则,没有心理现实性。虽然在形式语言学框架下量词是一个功能词,但功能词并非一定是中心语,还需要有一定的语义内容,得到语义的印证和支持(杨永忠 2010)。

针对目前学界将语言在名词量化方面的差异归结为语言类型差异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结构分析的现状,程工等(2015)提出了量词为轻名词 n 的观点,即量词是带有部分名词性特征的功能语类。轻名词 n 以 NP 为补足语,其标志语由数词短语充当。在推导顺序上, n 和 NP 属于首次合并, n 和 NumP 属于二次合并,其密切程度不及“n + NP”组合。

- (2) [ <sub>NP</sub> NumP [ <sub>n</sub> NP ] ]  
 (3) a. [ <sub>NP</sub> [ <sub>n</sub> n 个 NP 人 ] ]  
 b. [ <sub>NP</sub> Num 三 [ <sub>n</sub> n 个 NP 人 ] ]

(3)中,量词“个”基础生成于轻名词位置 n,其先与名词补足语“人”合并,形成“个人”组合。然后,该组合再与数词合并,形成完整的轻名词结构 nP,并构成一个语段。“个”所携带的不可诠释特征[ + 词缀性]在局部性区域内搜索,在下层找到“人”,其携带可诠释特征[ + 名词性]和不可诠释特征[ - 可数性]。“个”和“人”发生一致操作,删除“个”和“人”的不可诠释特征[ - 可数性]。

至此,一致推导结束(程工等 2015)。

作为一种新的量词结构分析模式,程工等(2015)似乎对量词和量词结构作出了完美的解释。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实,程工等(2015)同样面临着上述学者所遇到的问题,而且还有更多的相关理论问题需要回答。

首先,程工等(2015)的 nP 分析必须证明量词具有核心地位,可以决定其所在短语的句法性质和内部结构,然而,量词却不具有这样的功能。

(4)a. \* 那个三人

[<sub>NP</sub> Num [<sub>n</sub> n 那个 NP 三人]]

c. \* 那人三个

[<sub>DP</sub> Spec 那人 [<sub>NP</sub> Num 三 [<sub>n</sub> n 个 NP]]]

b. \* 三人那个

[<sub>NP</sub> Num 三人 [<sub>n</sub> n 那个 NP]]

d. \* 人那三个

[<sub>DP</sub> Spec 人 [<sub>NP</sub> Num 那三 [<sub>n</sub> n 个 NP]]]

(4)显示:量词对整个短语句法性质和内部结构的合法性无所贡献,换言之,量词前后成分单独来看都具有句法独立性,但是在量词结构中却变得不合法,原因在于量词结构分析,或者说,量词核心地位说既无法解释也无法预测合法的量词结构与不合法的量词结构。这从一个侧面证明:量词不具有核心地位。

其次,如果量词是核心词,那么,它就应当能够决定其前后成分的语义角色和线性关系。如果量词是核心词,那么,它就应当能够解释下列现象:

(5)a. 这三杯水

[<sub>DP</sub> Spec 这 [<sub>NP</sub> Num 三 [<sub>n</sub> n 杯 NP 水]]]

b. 这三个杯子的水

[<sub>DP</sub> Spec 这 [<sub>NP</sub> Num 三 [<sub>n</sub> n 个 NP 杯子的水]]]

c. 三杯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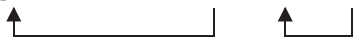
[<sub>DP</sub> Spec [<sub>NP</sub> Num 三 [<sub>n</sub> n 杯 NP 的水]]]

d. 这三杯水

[<sub>DP</sub> Spec 这 [<sub>NP</sub> Num 三 [<sub>n</sub> n 杯 NP 的水]]]

上述例子的差异无法从结构上得到清晰的显示,而且 nP 解释不符合汉语语感,缺乏心理现实性<sup>①</sup>。根据程工等(2015),作为轻名词的量词优先与名词补足语合并,然后,该组合再与数词合并。(5)显示:若中心语 n 为“个”,其与 NP“杯子的水”就会生成一个不可思议的组合“个杯子的水”;如果 n 为“杯”,其与 NP“的水”形成的组合同样令人费解。而且,nP 分析无法解释(5a)、(5b)、(5c)和(5d)之间的差异。为了解释“三杯水”,程工等(2015)将其分析为(6)。

(6) [<sub>DP</sub> Spec [<sub>D</sub> D 的 [<sub>NP</sub> Num 三 [<sub>n</sub> n 杯] [<sub>NP</sub> t<sub>i</sub> 水]]]



(6)中,“的”是 D 的语音实现,其特征为强特征,因此,必须有成分占据其标志语位置核查该特征,即“的”的强 EPP 特征要求名词组合“三杯”显性移位至 DP 的标志语位置,形成表层语序。然而,这里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1) 数词“三”与量词“杯”位于不同的句法层级,如何以一个句法成分移位? 2) 量词作为轻名词,理应基础生成于轻名词位置 n,然而,(6)中的“杯”却基础生成于 NP 的标志语位置,然后才移位至 n 位置,这样的分析与程工等(2015)提出的理论假设不一致,自相矛盾,且有理论特设之嫌。这表明:nP 分析无法准确刻画量词结构的内部结构和语义关系。

再者,如果量词是核心词,那么,它就应当能够决定其前后成分的句法表现形式,即其前后成

<sup>①</sup> 杨永忠(2008,2010)证明:“的”附加于标志语或补足语,不能与前面的名词拆开。



成分的关系则较为松散,因此,“数词+量词+名词”应当分析为[[数词+量词]+名词],而不是[数词+[量词+名词]],因为量词不能成为中心语D,不能决定整个定语的语类特征、线性句法关系、AGR特征、题元角色和格位指派。实际上,量词与标志语XP无直接关系,同样,它与补足语YP亦无直接关系。因此,程工等(2015)的分析模式无法解释(4)-(7)中的现象,也无法预测合法的量词结构与不合法的量词结构,这样,程工等(2015)同样陷入了Tang(1990)、Xue & McFetridge(1995)、Au Yeung(1997,2005)、Cheng & Sybesma(1999)、Li(1998,1999)、Hu & Pan(2000)、Tsai(2003)等的理论困境之中。

第五,nP分析缺乏语言普遍性意义。如果说汉语量词是一个功能范畴,那么,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侗台语族和苗瑶语族以及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等诸多语言中的量词都理应具有同样的句法地位。然而,根据徐丹、傅京起(2011),无论是汉藏语系侗台语族和苗瑶语族、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的“数词+量词+名词”型结构,还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和羌语支的“名词+数词+量词”型结构,抑或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和景颇语支的“名词+量词+数词”型结构,量词要么介于数词与名词之间,要么位于数词之后,但不可单独出现于数词或名词之前,同样,名词不可介于数词与量词之间,量词决不能与其所附属的数词分割开,更不能作为句法中心语。这一结论得到了跨语言的验证,因而具有普遍的语言类型学意义。这表明,nP分析缺乏描写上的充分性与解释上的充分性,其理论概括缺乏普遍意义,解释力自然有限。

### 3. 量词和量词结构的重新认识

#### 3.1 量词作为功能语类的句法地位

与上述生成语法学者不同,我们认为,量词并非核心词,其对所在短语的语义构成无所作为,换言之,它本身并不包含语义值,因而语义上不能对所在短语有任何贡献<sup>③</sup>。根据杨永忠(2008,2010),功能语类作为句法中心语必须具有以下特征:

- 1)可以决定其所在短语的句法特征,即[±N]性或[±V]性;
- 2)可以决定自己的补足语由什么语类担任;
- 3)可以决定其所在短语内部成分之间的性、数、格一致;
- 4)具有句法-语义自足性。

从句法上说,量词符合Ouhalla(1991)所列举的功能语类的鉴定标准:属于“封闭语类”,成员数量有限,且不允许出现有意识造出的新词;没有语义选择性,即不能决定自己的论元带什么样的题元角色;有附着性,属于粘着语素,不能单独使用。但是,它却不像冠词等其它功能语类那样具有性/数屈折形态,可以决定与动词的一致关系。这个特性在英语中有一定的表现,而在德语、法语等其它语言中则表现得更加明显<sup>④</sup>。量词对其后的名词并不具有数的标志作用,也就不能成为其所在短语的句法中心语。其次,作为合法的句法中心语,其必须具有句法自足性。无论是冠词、屈折语缀,还是标句词(Complementizer),它们都具有句法自足性,也就是说,经过切分,由其构成的中心语短语或子句具有完整的句法功能,能够单独充任句子成分。既然如此,以量词为中心语的短语结构同样应当具有句法自足性。而且,量词作为量词型语言的必有标记,所有的量词型语言中的量词都应当具有相同的句法功能。如果说汉语的量词具有可切分性,由其投射而成的结构具有可自足性,那么,具有相同功能的汉藏语系的其它语言以及阿尔泰语系和南亚语系语言中的量词也应当具有可切分性,由其投射而成

<sup>③</sup> 吕叔湘、朱德熙(2002[1953]:6)指出,就意义而言,量词本身空空洞洞,并不像一般名词那样有具体意义。

<sup>④</sup> 详细讨论见杨永忠(2008)。

的结构也应当具有可自足性。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实际上,包括汉语在内的所有汉藏语系语言以及阿尔泰语系和南亚语系语言中的量词与其所附缀的数词都具有不可切分性,否则不合法,换言之,以此类功能语类为中心的短语缺乏句法自足性,因而不具备作为句法中心语的条件。

根据 DP 假设 (Abney 1987:193-200), D 之所以为 D, 就是因为它在名词短语中对其后的名词或动词起特指、泛指以及表示数量等限定作用, 缺少了它, 短语或子句就不合法或不可接受。D 是名词短语结构上的组成部分, 它和名词或动词有着结构上的联系, 不可或缺。D 标志短语的语法关系。由于量词不具备上述特征, 因此, 量词不是句法中心语<sup>⑤</sup>。实际上, 量词仅仅是附加于中心语的附缀, 其本身并非其所在结构的中心语, 因而无法形成最大投射 CIP。

那么, 量词的句法地位是什么呢? 量词在结构中充当联结项, 将不同类型的标志语或补足语与中心语连接起来。量词可以附加于数词或指示代词, 表示数量、指称属性。因此, 量词结构就应当分析为:

(12) [<sub>DP</sub> ZP [<sub>D</sub> D - 量词 YP]]

(12) 显示: 量词附加于中心语, 量词为中心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心语为 D, 由数词或指示代词充当; 整个结构具有 [+ Num] 或 [+ Def] 特征, 乃是由于 D 的存在, 而不管其是显性形式还是隐性形式; 虽然指示代词和数词后面都可以跟量词, 但一个数量名结构只允许一个量词出现, 换言之, 如果指示代词和数词同时出现于一个结构中, 那么, 指示代词后面的量词必须删除, 而只保留数词后面的量词。

### 3.2 量词和量词结构的句法语义特征及推导

量词是现代汉语可数名词使用数词进行量化时所必需的语法成分。“数词 + 量词 + 名词”结构是量词结构的基本形式。量词与可数名词关系紧密, 特别是在可数名词数量意义表达中是必需的句法成分。量词必须与数词或指示代词一同出现, 而不能单独使用 (安丰存、程工 2014)<sup>⑥</sup>。汉语指示代词与名词之间通常要有量词插入, 只是在个别情形下可以省略, 而所有的数词与名词之间必须有量词插入。仅有数词的名词短语仅仅具有数量属性, 往往被理解为无定, 只有指示代词才可使名词短语具有定指特征。

(13) a. 一辆车 那辆车 三辆车 那三辆车      b. \* 辆车  
c. 这屋 那人                                              d. 这间屋 那个人

因此, 量词结构本身不带有定或无定信息, 有定或无定信息的表达需要借助于指示代词; 同样, 量词结构也不表示单数或复数的意义, 单数或复数的意义需要通过添加数词来实现。

汉语量词的隐现与位置有关, 越靠近标志语, 量词则越趋向于省略; 越靠近名词补足语, 则越不能省略。量词可以叠用, 此时, 只有数词“一”可以与之同现, 如(14)所示。如果指示代词与数词同时出现于一个名词短语中, 那么, 只有一个量词可以出现, 而且指示代词必须前置于数词。如果量词为核心词, 量词与指示代词或数词竞争同一个句法位置, 那么, 量词就不能与指示代词或数词同现, 如(15)所示。

(14) a. (一)阵阵微风                                      b. (一)朵朵鲜花  
(15) a. 我的那三篇文章                                      b. \* 我的那篇三篇文章

(16) a. [<sub>DP</sub> Spec 我的 [<sub>D</sub> D 那三篇 YP 文章]]      b. \* [<sub>DP</sub> Spec 我的 [<sub>D</sub> D 那篇三篇 YP 文章]]

无论是语义关系还是句法结构, 指示代词与名词补足语关系更为接近, 物主代词与名词补足

<sup>⑤</sup> 根据最简方案 (Minimalist Program), 那些只表示语法关系而缺乏任何实质意义的功能词, 不能作为中心语 (Chomsky 1995)。

<sup>⑥</sup> 在句子层面, 量词的重叠形式可以独立充当句法成分。如果数量结构出现于宾语位置且数词为“一”, 数词可以省略, 数量结构以“量词 + 名词”形式出现。

语关系更为疏远。指示代词或数词占据 D 位置,携带有定、有指信息或计数特征,决定整个短语的性质和结构特征,而物主代词则处于短语结构的外层,即标志语位置。

一般而言,功能语类前的成分在线性位置上先于中心语,占据标志语位置,其语义属性优先确定,而功能语类前成分的语义属性一旦确定,则处于补足语位置的其它成分的语义属性须以其为依据确定。这表明:前后成分的语义属性决定关系具有单向性特征。短语结构与子句结构相似。线性关系和语义属性并非由其自身决定,而是由中心语决定。虽然汉语物主代词在线性顺序上先于指示代词,处于比指示代词更外层的位置,但整个短语的有定性或无定性特征仍然由指示代词决定。根据胡建华(2008),一个句法成分被句法结构指派的特征要与信息结构对其作为信息载体进行信息分拣时所指派的解读保持和谐对应。中心语前面的成分占据标志语位置,在线性顺序上得到优先解读,“物主代词+指示代词+数词+量词+名词”语序符合这一原则。由于量词属于联结项,量词始终附缀于中心语,而不是独立作中心语。决定补足语位置上句法成分的语义属性的是中心语,而不是量词。这一点可以通过下列例子得到证明。

(17) a. 三杯水            b. 三杯的水            c. 这三杯的水

(18) a. 三本书            b. \*三本的书            c. \*这三本的书

(17)与(18)的差异在 ClP 和 nP 分析模式中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17a)与(17b)和(17c)的内部结构不同,同样,(18a)与(18b)和(18c)的内部结构也不同,如(19)和(20)所示。

(19) a. [ DP Spec [ D, D 三杯 NP 水 ] ]

b. [ DP Spec [ D, D 三 NP 杯的水 ] ]

c. [ DP Spec [ D, D 这三杯的 NP 水 ] ]

(20) a. [ DP Spec [ D, D 三本 NP 书 ] ]

b. \* [ DP Spec [ D, D 三 NP 本的书 ] ]

c. \* [ DP Spec [ D, D 这三本 NP 书 ] ]

(19a)显示:量词“杯”与数词“三”合并,占据 D 位置,修饰占据补足语位置的名词“水”。(19b)显示:数词“三”占据 D 位置,“三”后的量词为以隐性形式存在的“个”,“杯”通过功能范畴“的”与“水”组成名词短语“杯的水”,占据补足语位置,此时,“杯”不是量词,而是名词“杯子”的简缩形式。因此,(19b)的完整句法结构为“三个杯子的水”,语义为“三个杯子中的水”。如果结构中出现指示代词,那么,“三杯水”就变成“这三杯水”,意为“这三个杯子中的水”,如(19c)所示。显然,(19b-c)中的“杯”都不是量词,而是名词,这是其与(19a)的相异之处。就(20)而言,(20a)与(19a)结构完全相同,分析从略。(20b)和(20c)的不合法就在于:这两个结构中的“本”不能充当名词,而只能作量词,因为无论是“三个本子的书”还是“这三个本子的书”在汉语中都是不合法的。与 ClP 和 nP 分析模式相比,我们提出的量词结构分析模式可以更为合理地解释量词和度量词之间的差异,准确刻画同一个词在不同的场合可能承担的不同的句法语义角色。除此之外,该模式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名词可以前置于数词和量词,形成“名词+数词+量词”结构。名词可以以循环移位的方式移位至 DP 的标志语位置,这表明:结构中不允许出现指示代词,否则,推导无法完成,造成结构不合法。显然,指示代词在结构中会构成一个语障,阻碍名词移位。

(21) a. 学生三名

b. [ DP Spec 学生<sub>i</sub> [ D, D t<sub>i</sub> [ NumP Num-Cl 三名 NP t<sub>i</sub> ] ] ]<sup>⑦</sup>

⑦ 为了清晰地显示指示代词在句法结构中的作用,我们将句法体 D' 进一步细分为“指示代词+数词+量词”,逻辑式为“[ DP Spec [ D, D [ NumP Num-Cl NP ] ] ]”。

(22)a. \* 学生这三名

b. \* [ <sub>DP</sub> Spec 学生<sub>i</sub> [ <sub>D</sub> 这 [ <sub>NumP</sub> Num-Cl 三名 NP t<sub>i</sub> ] ] ]

DP 的标志语位置是名词短语结构的边界,边界特征要求中心语的边界必须有一个成分,NP 移位就是为了满足这个边界特征,填补名词性短语的标志语位置。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学生三名”具有述谓性特征,数量词“三名”充当子句的述谓成分,而“三名学生”仅仅具有描写性特征,数量词“三名”充当修饰成分(参阅吴福祥等 2006)。由此可见,“数词+量词”组合具有两重性:既能作论元,又可作谓语。无论句子平面还是名词短语平面,中间层次的短语都具有两头的某些性质,但又具有自己的内部结构并保持自己的身份(李艳惠、陆丙甫 2002)。

根据徐丹、傅京起(2011),量词语序有三种类型:1) 侗台-苗瑶型,即“数词+量词+名词”结构;2) 藏-景颇型,即“名词+量词+数词”结构;3) 彝-羌型,即“名词+数词+量词”结构。三种类型中,只有侗台-苗瑶型语言与汉语相同,另外两种类型语言与汉语都存在差异。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上述差异呢?或者说,我们提出的量词分析模式能否解释这些差异呢?我们认为,量词型语言数量名结构的内部结构为[ <sub>DP</sub> Spec [ <sub>D</sub> D [ <sub>NumP</sub> Num-Cl NP ] ] ]。藏-景颇型语言的“名词+量词+数词”型语序和彝-羌型语言的“名词+数词+量词”型语序都是名词移位的结果。指示代词不可出现于名词前并对其进行限定。

(23)a. [ <sub>DP</sub> Spec [ <sub>D</sub> D [ <sub>NumP</sub> Num-Cl NP ] ] ] 汉、侗台-苗瑶型

b. [ <sub>DP</sub> NP<sub>j</sub> [ <sub>D</sub> D [ <sub>NumP</sub> Cl<sub>i</sub> Num-t<sub>i</sub> t<sub>j</sub> ] ] ] 藏-景颇型

c. [ <sub>DP</sub> NP<sub>i</sub> [ <sub>D</sub> D [ <sub>NumP</sub> Num-Cl t<sub>i</sub> ] ] ] 彝-羌型

在语言实际生活中,“名词+量词+数词”型语序一般都很少,而“名词+数词+量词”型语序则比较丰富,乃是由于前者需要移位的成分较多,包括名词和量词,操作起来没有后者经济,后者仅仅需要名词移位即可生成表层语序。这证明:[ <sub>DP</sub> Spec [ <sub>D</sub> D [ <sub>NumP</sub> Num-Cl NP ] ] ]的确是量词型语言量词结构的基本结构。

与实词语类的题元特征释放(theta-feature discharge)不同,功能语类中心语 X 通过 XP 向其标志语和补足语释放次语类特征(subcategorization feature)(参阅 Fukui 2000),X 决定 YP 和 ZP 的句法表现形式,即显性拼读或隐性表达,并对 YP 和 ZP 指派数或指称特征。

(24) 这间屋 = 这屋

a. [ <sub>DP</sub> Spec [ <sub>D</sub> D 这间 NP 屋 ] ]

b. [ <sub>DP</sub> Spec [ <sub>D</sub> D 这 ∅ NP 屋 ] ]

(25) 这杯水 = ? 这水

a. [ <sub>DP</sub> Spec [ <sub>D</sub> D 这杯 NP 水 ] ]

b. \* [ <sub>DP</sub> Spec [ <sub>D</sub> D 这 ∅ NP 水 ] ]

(24)和(25)的对比表明:量词可以省略,而度量词则不能。造成这种结构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在“指示代词+量词+名词”结构中,指示代词在量词以隐性形式存在的情况下可以对名词做出限定,赋予其特指性特征,并隐含“单一”的语义,即数词为“一”;相反,在“指示代词+度量词+物质名词”结构中,指示代词在度量词省略的情况下无法对名词赋予特指性特征,更无法蕴含“单一”的语义,因为这类名词具有不可切分性,其语义切分、指量只有借助于度量词方能实现。显然,决定量词隐现及其在 DP 结构中的位置的关键因素是 D。

#### 4. 结语

本文首先提出量词和量词结构分析上的一些问题。量词并非核心词,而仅仅是附加于中心语

的附缀,其本身并非其所在结构的中心语,因而无法形成最大投射 CIP 或 nP。作为对 DP 分析和量词结构理论的补充和完善,我们提出基于 DP 理论的量词结构分析模式,该模式可以有效地解决 CIP 和 nP 分析模式在解释量词结构方面所遇到的难题,而且得到了跨语言的证明。这就使量词结构分析假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合理基础。一方面,它符合 X-标杆理论对建立短语所需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不同语言的量词结构作出统一的解释。

#### 参考文献:

- [1] Abney, S. *The English Noun Phrase in Its Sentential Aspects*[D]. Ph. D diss., MIT, Cambridge, MA, 1987.
- [2] Au Yeung, B. W. -H. (欧阳伟豪). A parametric analysis of Cantonese and Mandarin nominals[C]. *Proceedings of the Postgraduate Research Forum on Language & Linguistics* 7, 1997. 186-97.
- [3] Au Yeung, B. W. -H. (欧阳伟豪). An interface program for parameterization of classifiers in Chinese[D]. Ph. D diss.,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ng Kong, 2005.
- [4] Cheng, L. L. -S. (郑礼珊)& R. Sybesma(司马翎). Bare and not-so-bare nouns and the structure of NP[J]. *Linguistic Inquiry*, 1999, (30): 509-542.
- [5] Chomsky, N. *The Minimalist Program*[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5.
- [6] Fukui, N. Phrase Structure[C]// Baltin, M. & C. Collins. *Th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Syntactic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0. 374-406.
- [7] Gao, Q. (高茜). Chinese NP structure[C]// Pollard, C. & A. Kathol. *Ohio State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42. Ohio State University, Columbus, OH, 1993. 88-116.
- [8] Hu, J. (胡建华)& H. Pan(潘海华). Deriving the subject-object symmetry in topicalization[C].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opic and Focus*, Hong Kong, 2000.
- [9] Jiang, L. *Nominal Argument and Language Variation*[D]. Ph. 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2012.
- [10] Li, Y. -H. Audrey(李艳惠). Argument determiner phrases and number phrases[J]. *Linguistic Inquiry*, 1998, (29): 693-702.
- [11] Li, Y. -H. Audrey(李艳惠). Plurality in a classifier language[J].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999, (8): 75-99.
- [12] Ouhalla, J. *Functional Categories and Parametric Variation*[M]. London: Routledge, 1991.
- [13] Radford, A. *Syntax: An Minimalist Introduction*[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1.
- [14] Tang, C. -C. (汤志贞). A note on the DP analysis of Chinese noun phrases[J]. *Linguistics*, 1990, (28): 337-354.
- [15] Tsai, W. -T. D. (蔡维天). Three types of existential quantification in Chinese[C]// Li, Y. -H. A. & A. Simpson. *Form, Interpretation and Functional Structure: Perspectives from Asian Languages*. London: Curzon / Routledge, 2003. 161-179.
- [16] Xue, P. (薛平)& P. McFetridge. DP structure, HPSG and the Chinese NP[C]. *Proceedings of the 14th Annual Conference of Canadian Linguistic Association*, 1995. 1-15.
- [17] 安丰存,程工. 生成语法视角下汉语量词句法功能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4, (3): 51-58.
- [18] 安丰存,程工. 汉语数量结构演变及量词产生的语言认知机制[J].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 103-110.
- [19] 贝罗贝. 上古、中古汉语量词的历史发展[J]. *语言学论丛*, 1998, (21): 99-122.

- [20] 陈练军. 居延汉简量词的分布特征[J].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 2005, (1): 68-72.
- [21] 程工, 杨大然, 安丰存. 量词结构与假部分结构的统一分析[J]. 当代语言学, 2015, (1): 56-70.
- [22] 高名凯. 汉语语法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23] 何晓炜, 蔡激浪. 量词的特征分解分析[J]. 当代语言学, 2015, (1): 71-74.
- [24] 胡建华. 现代汉语不及物动词的论元和宾语[J]. 中国语文, 2008, (5): 396-409.
- [25]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增订二版)(下)[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 [26] 蒋颖. 汉语名量词虚化的三种机制[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5, (1): 39-43.
- [27] 李若晖. 殷代量词初探[J]. 古汉语研究, 2000, (2): 79-84.
- [28] 李艳惠. 空语类理论和汉语空语类的辨识与指称研究[J]. 语言科学, 2007, (2): 37-47.
- [29] 李艳惠, 陆甫甫. 数目短语[J]. 中国语文, 2002, (4): 326-336.
- [30]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 [31] 吕叔湘, 朱德熙. 语法修辞讲话[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1953].
- [32] 马庆株. 汉语语义语法范畴问题[M].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8.
- [33] 王力. 汉语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34] 吴福祥, 冯胜利, 黄正德. 汉语“数+量+名”格式的来源[J]. 中国语文, 2006, (5): 387-400.
- [35] 吴义诚. 语言学研讨: 量词的结构、语义与语用[J]. 国际学术动态, 2014, (6): 9-10.
- [36] 徐丹, 傅京起. 量词及其类型学考察[J]. 语言科学, 2011, (6): 561-573.
- [37] 杨永忠. “的”的句法地位及相关理论问题[J]. 汉语学报, 2008, (3): 51-63.
- [38] 杨永忠. “的”和“的”字结构再分析[J]. 外国语, 2010, (5): 34-44.
- [39] 张谊生. 从量词到助词——量词“个”语法化过程的个案分析[J]. 当代语言学, 2003, (3): 193-205.
- [40]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收稿日期: 2015-12-24

作者简介: 杨永忠(1968-), 男, 云南玉溪人, 副教授。研究方向: 句法学、语义学。

## 关于《外国语》投稿方式和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声明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是我国语言学 and 外国语言文学的专业性刊物之一。请广大作者务必注意, 本刊全面采用网上投稿系统进行稿件审理, <http://jfl.shisu.edu.cn> (含上海外国语大学网站域名) 是《外国语》杂志唯一合法网站, 且只接受通过此网站“作者投稿”程序所进行的投稿, 其他相似域名的网站及其投稿系统均属假冒侵权, 请作者投稿时注意辨识。本刊编辑部从不收取任何形式的评审费和版面费, 从未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有偿征稿或荐稿; 反对抄袭、剽窃等侵权行为。

《外国语》编辑部联系电话: 021-35373317, 编务邮箱: [waiguoyu1978@shisu.edu.cn](mailto:waiguoyu1978@shisu.edu.cn)。

《外国语》微信公众号: 外国语(在“添加朋友-查找公众号”中搜索“外国语”添加关注, 或用“扫一扫”直接扫描右下方二维码)

